

有病亂投醫

——「新文化運動百年反思」第二場會議綜述

Looking for all false cures when being truly ill——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One Hundred Year Reflection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白 彤 東^{*}

Bai Tong-dong

2014年夏，北京大學、復旦大學、臺灣大學、浙江大學、安徽大學五校的哲學系與中文系的一些學者，從合肥出發，過陳獨秀老家懷寧（現屬安慶市），在黃山腳下的績溪、胡適的老家，討論群組織紀念新文化運動百年的系列會議。其結果是決定這個系列會議從安徽大學開始，重點是文學（安徽大學來籌備會的學者全部是中文系的）。之後分不同主題，由餘下四校（籌備會這四校來的都是哲學系的人）分別承辦。本來復旦應該是由院長孫向晨教授參與籌備會，但

^{*} 作者現任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是因為他當時不在大陸，所以我代他參加。之所以要交代這個細節，是想指出，我參與這個事件，並非主動。不主動的根源，是我覺得，新文化及後來的五四等激進思潮，基本上是一場錯誤的運動。當時中國確實有病，也要治，但是新文化與五四開出的方子，多是錯誤的方子，要為中國之後百多年的動盪與悲劇負責。有了這樣的判斷之後，我自己現在更關心正面、建設性地闡發傳統的當代意義，而不是繼續去論證這場運動的錯誤。但是，因為開始偶然的捲入，所以之後也參與了復旦會議的組織工作，以及作為發言人之一參與了北大的會議。下面，就復旦會議，從我自己的興趣和關注出發，我來給我的一些偶錄與隨想。

復旦大學所承辦的新文化系列會議，於2015年3月14-15日召開，主題是「問題與主義」。在中國大陸，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左派與右派雖然位居兩極，但是在反傳統上，卻經常可以精誠團結。這在新文化運動上表現的更加明顯。如參會的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唐文明在討論時所說，新文化與五四帶來了原子式的個體，這為自由派所讚揚。其另一個後果，是黨國政體乃至極權政府，這又為左派所推崇。其實，如筆者在不同地方指出過的（包括本人在北大會議上的發言：〈中國如何成為一個專制國家——從孟德斯鳩談起〉），由於簡單照抄如西人孟德斯鳩對中國傳統政治的錯誤理解，沒有理解孔家店對皇權的制衡作用，本來想攻擊專制，卻砸了孔家店，結果是中國越來越專制。具體地講，當家庭、宗族、鄉紳、士大夫等等都在個人自由與解放的旗號下被砸爛的時候，一盤散沙的「原子」個體恰恰為專制與極權準備了最好的土壤。也就是說，大陸右派（自由派）所推崇的從新文化開始的個性解放，恰恰是他們最大的敵人左派所推崇的黨國政體的前提。這種對新文化與五四運動的評價，漸漸成為大陸傳統「主義」者的共識，但同時也使得他們常常成為左右共同的敵人。這場會議上，從或左、或右的立場歌頌新文化、批評當代傳統主義者的聲音，還是存在，但並非主導（對此本人作為組織者之一要承擔責

任)。但在大陸的知識分子與大眾中間，恐怕這樣的聲音，依然是主流。

回到唐文明教授的會議發言，它是基於唐教授已經在《讀書》上發表出來的三篇系列文章，並加上了「新文化運動與啟蒙的烏托邦——『五四』三論」這麼一個統一的題目。在其第一篇〈夭折了的啟蒙還是啟蒙的破產〉中，他指出，新文化和五四的啟蒙裡面暗含著激進和革命（包括革命之極致的文革）的主線。李澤厚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之說是用救亡的急迫為百年激進負責，從而為啟蒙辯護。¹但唐教授試圖追究啟蒙本身的激進，並進而指出：「既然『文革』在思想層面上可以溯源於新文化運動的激進主義啟蒙謀劃，那麼，『文革』的發生與失敗就意味著這種激進主義啟蒙謀劃的徹底破產。」²對此，一些與會者有不同的意見。比如，北京大學的韓水法教授指出，唐文明教授用胡適、陳獨秀、毛澤東等人的言論，去展示五四與文革的觀念相似，進而論證啟蒙要為文革負責，這犯了從觀念到觀念的錯誤。五四與文革的歷史情境不一樣。作為唐教授發言的評論人，筆者指出，雖然國共兩黨都是從新文化與五四運動中走出來的激進政黨，但是畢竟國民黨沒有走向文革。也就是說，雖然新文化與五四的激進思想確實是文革發生的一個因素，但不是一個充分條件。只有通過一個最激進的政黨和它的癡狂的領導者，文革才能發生。換句話說，唐教授的這種說法，有為毛澤東卸責的客觀效果，但毛本人在大

¹ 當然，啟蒙下的民主與科學，可能本來就是為了救亡（唐教授自己在文章中也有類似的說法，即啟蒙乃是政治運動，其意圖恰恰是救亡）。但是，新文化與五四一代把何以能最快地救亡圖存理解錯了。他們乃至當今大陸自由派中的很多人認為。民主乃至憲政事關中國的救亡圖存，但是這二者的關係可能不大（但這不等於說它們不可欲）。救亡圖存之最快的（也是很「有毒」的）途徑，是二戰前日本與德國式的軍國主義下的工業化，而這種做法，無非是把秦國統一六國的努力中所做的，在工業化背景下，與時俱進地再做一遍而已。而這種毒素的去除，就是漢代人所做的儒法互補。也就是說，救亡的辦法乃至對救亡的惡果的抑制，在認識到工業化所帶來的種種社會與政治變革的基礎上，本來是不用外求的。

² 本文所引唐教授的說法來自於他惠賜筆者的文稿。

陸易幟之後種種激進政策上，是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另外，唐文明教授講胡適是左翼自由主義者。但他是哪一種左翼自由主義者？唐教授似乎暗示是法國式的。但唐教授所引的胡適的「努力謀人類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聽起來像是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與彌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式的功利主義者的說法。這裡就有了兩個問題。第一，我下面會提到，高全喜教授會指出，新文化運動中的啟蒙思想是法國式的啟蒙，而蘇格蘭啟蒙是缺位的。這是新文化運動啟蒙之激進的根源之一。第二，如果邊沁也可以被當作蘇格蘭啟蒙的餘緒，那麼是不是這種啟蒙思想也可以成爲激進革命的基礎？功利主義者確實也自稱爲“radicals”，但邊沁和彌爾對平等之類的追求，並沒有促使英國走向激進的反傳統道路。

在對新文化成爲中國百多年激進的根源進行批評後，唐教授的系列文章正面處理了中國重建的問題。關於這一點，他提出一個再造的中國要定於一、定於民、定於孔。在徹底清算新文化以來對民主與科學的盲目崇拜之後，對中國百年再造的道路上沿這「三定」所做出的努力與成果要給予肯定。定於一，就是要成爲一個自立統一的國家。但是，這裡唐教授沒有、而筆者認爲應該明確指出的是，先經新文化的激進反傳統、然後再走出來去清算其激進與盲從，不是中國再造的必經之路。我們完全可以走君主立憲的道路，甚至是經過一段「軍國」道路然後再走向憲政的道路。中國在前一種道路上的努力失敗了，而國民黨政府理論上所說的「軍政、訓政、憲政」，可以說正是後一種道路的表達。並且，在實踐上，在失去大陸之後，可以說它確實成功了。至於定於民，唐文明教授理解爲倫理社會主義，並將其當成一個中國思想界的最高共識。在這一點上，他對1949年以後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接受的（他指出溝口雄三也持類似的觀點），但要求深刻反思與批判1957年乃至文革的激進（及其新文化的根源）。對此，筆者持保留意見。誠然，儒家講民本。但是，我所理解的先秦儒家，大人、賢能、士人治國也是個根本的概念。如果我們把定於民理

解爲民本、甚至是人民主權，我所理解的儒家可以接受。但是如果理解爲民治、或是靠政府力量、甚至是暴力手段去實現政治與經濟的絕對平等（這是社會主義改造中出現的，尤其對鄉紳以打土豪名義血腥鎮壓、對民族資本家的掠奪式改造），這裡是儒家應該拒絕的。最後的定於孔，是以某種孔教的方式，爲中國人提供精神歸宿。但筆者以爲，因爲「宗教」在當代已經被徹底用西方排他性宗教來理解了，哪怕我們以公民宗教或者教化來解釋孔教，也是給自己找不必要的麻煩。筆者所堅持的，是以儒家思想爲根基的「薄」的道德認同（比如敬天法祖）。

唐文明教授的發言所根據的是一系列文章，並且作爲評論人，我詳細讀過。更重要的是，他的很多說法，我都非常認同。因此，對他的觀點，這裡討論的多些。在這場會議裡面，還有其他的近代史學者，從對歷史細節的考察上，對新文化運動的激進進行揭示和批評。比如，來自華東師大的瞿駿教授，在考察參與新文化運動的地方菁英的基礎上，指出新文化的啟蒙對象並非平民，而是邊緣的青年知識分子。對後者的迎合，與新文化的激進是相關的。新文化是希望通過反傳統而愛國、反傳統而加入世界。但是前者有自相矛盾之嫌，至於後者，瞿駿指出，當時沒有學貫中西的人。胡適可以說是勉強貫西，章太炎勉強貫中，這也決定了加入世界努力背後的思想貧困。與瞿駿教授的觀點呼應，另外一位來自華東師大的近代史學者唐小兵教授指出，從傳統政治菁英內部的士大夫之士議，到清末民初的文人政治，言論變得越來越極端且不負責任。這種文人政治，表現爲觀念上的激進主義，情感上的失敗主義，政治上的無政府主義。這些文人，如杜亞泉指出的，是貴族性質與遊民性質的合一。他們對待人民的態度，也是矛盾的：人民既是他們膜拜的對象（人民主權），又是他們貶斥的對象（群氓）。

來自浙江大學的高力克教授，梳理了百年文化激進主義的歷史。他指出，現在的問題是孔子死了，雷鋒不見了。這裡所暗含的，是

在反傳統道德之後，重建的革命道德也失敗了，而一個沒有道德根基的國家是危險的這樣的擔憂。他也指出，革命和專制是孿生子，而歷史上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乃至中國革命印證了他的觀點。高教授的觀點，也與因故未能與會的清華大學秦暉教授的觀點呼應。後者形象地指出，新文化與五四本應反專制，即荊軻刺秦王。但是卻刺錯了對象，成了荊軻刺孔子。對此，筆者更指出，當代中國，很多反傳統人士，或是因為混淆了當代中國與傳統中國，糊裡糊塗地繼續著荊軻刺孔子的事業；更有一些人，不敢挑戰威權，只敢拿儒家來說事兒，可謂秦舞陽刺孔子！當然，筆者所不同意秦暉的，是他無視儒家在傳統政治中的「限政」因素，把傳統中國政治等同於法家（而儒家只不過是裝點門面），又把法家等同於專制。但他沒有看到以法家為代表所建立起來的現代中央集權的官僚體系，是所有現代國家（包括自由民主國家）所共用的。他只看到了秦制的陰暗面，而沒有看到它暗含著一些普世且必要的政治建構。這與歷史上批評傳統政治的儒者顧炎武在《郡縣論》裡所達到的見識，以及他提出的「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的主張，是沒法比的。筆者以為，秦暉對秦制理解的片面背後的原因，是混同了毛制（毛澤東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三十年的制度）與秦制。³

與高力克教授所講的革命與專制的孿生相關，北航的高全喜教授指出了歐洲有三種不同的啟蒙傳統，法國、德國、英國/蘇格蘭。真正順利導向憲政民主的，是英國的啟蒙傳統。但不幸的是，影響新文化與五四的，是法國的啟蒙傳統。之後，便是革命與專制的伴生。在追蹤新文化的思想根源上，上海師範大學蕭功秦教授指出，在百多年的國家轉型中，只有中國發生了這麼激進的對傳統的決裂，這是新文

³ 毛制與秦制的差別，筆者在兩篇通俗文章裡有所涉及（〈被冤枉的法家〉，刪節版發表於2014年12月4日的《南方週末》；〈中國要樹立國家權威，要儒法並用但要以儒為本〉，刪節版發表於2014年12月18日的《澎湃新聞》）。

化運動以來庸俗進化論盛行的結果。而清華大學法學院的許章潤教授呼應高全喜教授的觀點，認為這場激進運動是法俄革命的彌撒亞思想的影響。並且，用他生動的語言，許教授比喻說，五四以來的激進是遷責弑父情結，像個小孩外面受了欺負，於是回家亂砸。

當然，雖然新文化的思想根源是西方，其目標也是西化，但是日本在這裡起了至關重要的橋樑作用。很多中國人對中國傳統的攻擊，有意無意地借用了日本人、甚至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語言。直到今日，中國的一些反傳統自由派在醬缸中國傳統、醜陋中國人的時候，還是用這種近乎種族主義者的語言，這未免荒誕。但同時，這些「山寨」日本的中國人沒有看到，如上海社科院葉斌教授指出的，日本轉型成功與它的天皇和武士階層的領導有關。北京大學尹保雲教授也指出，明治天皇給士兵的紀律手冊中推崇孔子、推崇忠孝。但是，筆者認為，中國的反傳統人士沒有看到這一點，更沒有看到，日本的反「支那」的言論，其最終根據是「崖山之後無中國」，而日本才是華夏文化的代表，肩負著拯救東亞文明的使命。不幸的是，這些反傳統人士把日本人反對「當代」中國、而背後有華夏正統情結的言論，當成反對華夏的言論。在實踐中，我們先是廢除科舉。當文人無法通過科舉進入政治菁英階層，他們就從可能的改革力量，變成了造反的來源；接著就是他們推翻了帝制，進而打倒孔家店，為中國轉型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對新文化運動的批評，同時可以轉為對當代中國的建設。中國人民大學任鋒教授對北洋政府的制憲的回顧即為一例。他指出，新文化運動的代表陳獨秀連北洋政府制憲後比較溫和的尊孔都不承認，而胡適與陳獨秀只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差別，都是要用西方的主義徹底地、革命地重構中國。在當代中國又一次面臨制憲時刻的時候，北洋政府的制憲及其反響，能為我們提供很好的借鑒，因為我們的選擇是要接受一個有缺陷的憲法，還是要像中國一些激進自由派所希望的那樣，徹底重構憲法。

復旦大學孫向晨教授，則從更加哲學的層面，分析了新文化運動所帶來的個性解放的得失。從黑格爾的觀點出發，社會發展要從個體再走向個體的揚棄。在這一點上，新文化運動的個性解放是有意義的。但是，這之後沒有揚棄個體，與其上進行家庭重組，是新文化運動的問題。但是，筆者對此的保留意見是，先有極端個體、然後再揚棄這種方式是不是必然的？日本、韓國、新加坡、臺灣等東亞國家與地區並沒有經歷新文化運動的個性解放，似乎也很好（甚至更好）地融入工業化、全球化的社會。更一般地講，法治與權利，是不是一定要根基於極端的個體觀？筆者近年論述儒家與權利相容的一個核心觀點，是從晚期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的洞見出發，讓儒家可以不需要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彌爾、或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個體觀念，也可以認可權利，與西方的權利觀念達成重疊共識，而不是海外新儒家牟宗三等人通過接續康德來接續自由民主的方式。

孫向晨教授的會議發言，也與他另外一篇反思中國百多年變化的文章相關。在那篇文章中，他指出現代化要有雙重本體，其背後的所謂「普世價值」要與不同社會的特殊狀況吻合。中國轉型之困難的一個根源，尤其是中國自由派的一個問題，是只看到普世價值，沒有看到這一本體要和中國的特殊政治、社會、文化本體的接合。同時，他也批評了當代一些以文化特殊論來拒斥來自西方普世價值的做法，這一做法背後的問題，也是對現代化的這種雙重本體缺乏認知。誠然，現在一些儒者，是通過堅持中國文化的特殊性來反對普世價值的。但是，筆者近年的一個努力方向，是指出儒家乃至傳統中國政治可以提供另外一套普世價值。這套普世價值的價值，如果我們不相信歷史已經終結在自由民主的神話，在新文化以來的有病亂投醫的過程中，被徹底否定，或至少沒有被很好地審視過。如果我們能把它與其他普世價值放在一起，以新諸子時代的視角審視它，並且發現它確實是普世的，並且更可欲，那麼它不但可以救亡與啟蒙中國，還可以救亡與啟蒙世界。